

探幽
近代
电影海报

◆海派名物典藏◆

主编 张伟

刘
钢
◎ 著



海派名物典藏

主编 张伟

近代电影海报探幽

刘钢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电影海报探幽 / 刘钢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8

(海派名物典藏 / 张伟主编)

ISBN 978-7-5671-3669-4

I . ①近… II . ①刘… III . ①电影—
宣传画—研究—中国—近代 IV . ① J94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7368 号

海派名物典藏
丛书编委

王汝刚

王金声

王琪森

汤惟杰

邢建榕

宋路霞

张伟

李天纲

沈嘉禄

陈子善

郑有慧

钱乃荣

龚伟强

薛理勇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书 名 近代电影海报探幽
著 者 刘钢

出版发行 上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网 址 <http://www.shupress.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印 张 8.5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1-3669-4/J•500
定 价 75.00 元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
“310 与沪有约——海派文化
传习活动”项目支持

总序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的起源地，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源地。海派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源泉。海派文化典藏是海派文化研究、传承、弘扬和利用的重要载体，是海派文化研究、传承、弘扬和利用的重要载体，是海派文化研究、传承、弘扬和利用的重要载体。

自上海开埠，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发源地，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成为多元文化的重要聚集地与中兴之地，从而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海派文化。

上海为近代中国的先驱，是近代中国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重镇。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汇聚地，造就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大气谦和，兼容并蓄”的上海精神和海派文化气质，留下了大批具有重要文化信息含量的遗产。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上海，再次吹响重塑上海文化重镇的号角，进一步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打造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文化名片。汇集梳理海派文化典藏，可以挖掘丰富的海派文化资源，充实海派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提供一个研究中华文化、深度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视角。整理、开发、解读近现代上海文化遗存，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当下文化繁荣尤其是地方文化复兴，对进一步弘扬海派文化、彰显上海城市精神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海派名物典藏”主要选取近现代富含大量文化信息的资源，以纸质资料为主，涵盖了影剧说明书、老戏单、老唱片、老胶片、老书札、老照片、老包装、老明信片等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方面面的文化遗产，对其加以集中并进行深度文化解读。“典藏”

内容图文并茂，文以深刻解说图，图以紧密结合文，内容多为首次披露，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其撰写者均为长期涉猎并浸润其中的权威学者、专家及收藏家。可以说每部典藏都是一部文献历史记载，都是对某一门类的文化遗存的深度文化解读。

上海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城市，而且是一个非常精彩、色彩斑斓的城市。从过去到今天，这个“演艺之都”几乎每天有许多鲜为人知或众所周知的故事在上演。我们的工作，对于上海诸多文化遗存的解读、阐述仅仅是个开始，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寻访上海近代的传奇踪迹，彰显海派文化的精气神，同时也为文化大繁荣尽一份绵薄之力，为伟大时代大声呐喊。

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陈东

2018年7月11日

序

方保罗先生的电影藏品，是我在美国期间所见最丰富的一次。他的藏品种类繁多，包括了中国电影从默片到有声片、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国内到国外、从大陆到香港、从内地到海外、从影坛到影史、从明星到导演、从演员到编剧、从摄影到剪辑、从道具到服装、从布景到美术、从音乐到音响、从台词到对白、从画面到镜头、从胶片到数字、从实物到模型、从海报到说明书、从书籍到画册、从单片到合集、从普通到珍稀、从国内到国际、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

2017年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图书馆邀请我去看方保罗先生的捐赠藏品。方保罗是美国人，但却以收藏中国电影文献而名闻圈内，他的藏品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了“东亚”，应“东亚”盛邀，于是有了我的美国之行，主要就是去鉴赏这批藏品的文献价值。

我和方保罗先生在香港开会时见过面，他的藏品之丰我也早已耳闻，但在“东亚”真的面对他的这些藏品时，我还是吃了一惊。他的全部藏品装在180个纸箱里，当我们打开这些纸箱时，我的感觉只能以“惊艳亮相”这个词来形容：其中民国影刊收藏竟然有300种之多，影星原照收藏超过6000张，电影说明书和宣传单更多达几千种上万件，仅仅这些，就已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公藏机构的收藏，令人赞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还是那些电影海报。这些海报总数达到4000种左右，主要是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香港和内地地区影片的彩色海报，大都为全开幅面的大尺寸，色彩鲜艳亮丽，画面生动传神，其中不少还有诸如李小龙、成龙、周润发等大牌明星的亲笔签名，视觉效果绝对震撼，如果用上海话来形容就是：弹眼落睛！也正因为此，“东亚”在决定扫描这批珍贵文献先后次序时，排在首位的就是这批海报，而读者调看这批文献最多的也是这些海报，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说起中国电影海报的历史，一些专门介绍电影海报的著作都把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再生花》（明星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海报说成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海报，其实，这并不严谨。按道理，只要有电影放映就有产生电影海报的可能，但中国最初的一批电影，如《定军山》《难夫难妻》《阎瑞生》等，既未见海报实物存在，也没有文献能证明当时发行过海报。我所见到较早提到电影海报制作的是杨小仲，他在《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刊《中国电影》1957年1月号）一文中回忆：1924

上海是一个电影发源地，也是中国电影的中心。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上海拍了近1000部电影，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也是中国电影的中心。

上海是一个电影发源地，也是中国电影的中心。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里，上海拍了近1000部电影，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也是中国电影的中心。

年，自己导演《醉乡遗恨》时真正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写对白，自找演员，连“广告、海报、传单都由我设计”。《醉乡遗恨》的海报虽然目前没有见到实物，但其曾经存在却是可以确认的。说起海报，有人总以为它的样式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是什么模样，以前也一定是这样。这未免有点绝对。海报的样式其实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尺寸从小型到大幅，形式从简单到繁复，色彩从黑白到彩色等。特别是在中国，早期拍一部影片，几千元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因而不可能在海报上投太多，只要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就可以了，讲究艺术是后期的追求。从一些实物和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海报实样来看，20世纪20年代早中期的中国电影海报，一般均为单张，16开或8开幅面大小，颜色多为用石版或胶版单色印，也有部分用双色印刷的。画面多文图相间，文字部分占有较大空间，图则大都根据剧照所绘。也许这样色彩单调、构图简单的海报会令人大失所望，甚至于不承认其为海报。但当时的电影海报确实就是如此简单，我们还找不到更复杂一点的海报。真正具有现代形态的电影海报是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这有实物可以作证。其实，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好莱坞海报，有不少也很简单，这符合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至于究竟哪张是我国最早的电影海报，民间藏龙卧虎大有人在，还是等待时间检验为好，目前大可不必过分急躁。

中国电影海报，尤其是早期的电影海报，由于情况复杂，实物存世又太少，迷雾重重，困难多多，故一直没有一本具体论述的专著问世。现在，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刘钢先生的《近代电影海报探幽》一书和大家见面了，可谓难能可贵。刘钢不在电影界从事工作，也没有专业的研究背景，他有自己的工作，因为兴趣而走上了收藏和研究电影的道路，所碰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这种勇气值得赞叹，此为可贵之一。刘钢是以业余的身份来收藏研究电影海报，但又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之，勤恳而严谨，绝非一般收藏界人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漫不经心。据我所知，他是将工作收入的大部分拿出来收藏海报，且长期坚持，持之以恒。他住在北京，为了请上海的明星在海报上签名题词，留下一些痕迹，他不顾自己装着支架的有病心脏，一次次往返于京沪之间，乐此不疲，毫无怨言，这种坚毅执着的态度，是为可贵之二。业内收藏电影海报的人并不少，但刘钢有其自己独特的考虑，他知难而上，从一开始就把眼光瞄上了收藏难度最大的民国电影海报。据业内人士考证，民国时

期拍摄的电影大概在3000部左右，而保存下来的完整电影拷贝则不超过十分之一，得以躲避战争、运动等各种灾难而遗留下来的电影海报也绝不会多于此数。因此收藏难度之大，转让价格之高，都是行外人难以想象的。刘钢一次次像走钢丝一般，在国内外各种渠道斗智斗勇，抢救回一幅又一幅早期电影海报，心情为之大爽；又一次次面对心仪之物，却因囊中羞涩、交涉失败等各种原因而失之交臂，悔恨再三。这种专业的视野和全身心的投入，正是一个收藏家有别于他人的特殊之处，可视之为可贵之三。刘钢收藏电影海报，一开始是因为兴趣，浸淫其中之后，徜徉于艺术宝殿而不可拔，不甘心只做一个收藏家，遂起研究之念。几年来，他研读相关专著，趋访电影前辈，请教业内专家，专心致志，勤勤恳恳，下了很大功夫，记了无数笔记，开始登堂入室，有了自己的一点心得。他不惮起步之初的简陋，愿意拿出来和大家交流，以便互相补益，共享成果。这种积极大度的心态和积小流以致江海的宏愿，是我认为最可宝贵的，值得学习和提倡。

“海派名物典藏”丛书的出版，今年是第二年，和去年的两本相比，今年共有三本出版，前进了一步，可喜可贺。我们一直追求丛书的独特品质，强调内容的文献价值和文字的可读性、文本的图像化，我们现在这样尽力，以后也会一直坚持。刘钢的著作出版，而且是第一部讨论民国电影海报的著作，里面还附录了大量他千辛万苦从各地搜集来的海报实物彩图，弥足珍贵。我愿意写几句话，表达祝贺，也表示感谢。希望这只是他研究道路上的第一步，以后在收藏更多、更珍稀的电影海报的同时，也有更精彩的论述和大家见面！

张伟

2019年6月30日晨于沪南上海花园

目 录

早期电影海报的作者	/ 1
改名才有《出路》	/ 7
重听《四季歌》	/ 11
旧北京的电影产业	/ 14
美国印制的《三娘教子》海报	/ 18
湮没的悲歌——沦陷区的电影	/ 21
大片《万世流芳》	/ 31
霍元甲电影始于何时	/ 36
王丹凤的几部早期影片	/ 39
周璇演唱《不变的心》	/ 43
“满映”的电影	/ 47
童星于延江	/ 54
最初的长春电影制片厂	/ 58
“东影厂”的《民主东北》系列片	/ 62
李翰祥首登银幕的《满城风雨》	/ 71
秦怡终于签名了	/ 78
桑弧海报遗存	/ 81
费穆的最后一部影片	/ 94
“文华”后期的几部影片	/ 97
收藏朱石麟	/ 103
“小咪”李丽华	/ 108
附录：中国电影海报简史	/ 115
后记	/ 123

早期电影海报的作者

从清光绪后期开始出现，中国的纸质平面广告的应用便兴旺发达起来。清末民初，各种大幅的香烟、化妆品或其他商品广告画——月份牌广告画风靡大江南北，无论是印刷水平还是绘画技巧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并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准的广告牌（月份牌）画家。最早的有周慕桥、郑曼陀等，后来有谢之光、杭稚英、胡伯翔、周柏生、金梅生等，他们先是采用勾线设色的中国传统技法，后又采用西洋擦笔素描加水彩的混合画法，以类似于平光照片“甜、糯、嗲、嫩”的特色成为月份牌画法的主流，深受读者的欢迎。当时中外厂商投巨资采用“月份牌”做商品宣传，占据前位的是外资英美烟草公司和国人投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及华成烟草公司等。

相比之下，当时的电影海报就没有那么兴旺。因为电影海报功能单一，只为某一部电影服务，不像月份牌广告画不仅画面优美，而且可以当作年画张贴很久。再说电影海报的内容也并非老少皆宜，因为海报的内容随着电影剧情走，所以难免有光怪陆离的画面。而且电影海报是非卖品，也不随影片赠送给观众，影响力自然也就没有月份牌广告画大。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电影海报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候的电影海报无论是单色印刷的，还是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彩色印刷的海报，印刷制作都比较简单，也没有特意关于作者的记载。

既然在同一时期存在着那么多优秀的广告画家，为什么他们不参与电影海报的绘制呢？绘制电影海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广告画家身价都很高，一般电影公司请不起，大公司不愿请。

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记载，1923年该公司广告费内“月份牌”一项，预算达四万银元。英美烟草公司设有专门绘制广告的美术室，以高薪先后聘胡伯翔、

周柏生、倪耕野、吴少云等画家绘制“月份牌”。其中胡伯翔一人，英美烟草公司便给他每月500银元高薪。500银元在当时，已经可以拍一部中等成本的电影了。1921年早期电影人但杜宇集资1000银元，便创办了上海影戏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史别话》，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

既然月份牌广告画家的身价那么高，一般电影公司应该是请不起的。其实也并非完全请不起，主要是电影公司认为没有必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电影还处在起步摸索发展的阶段，大量的宣传费用主要花在各种报刊的广告宣传上，对海报的认知还没有那么清晰，最后花在制作海报上的钱自然是少之又少，所以20年代的电影海报以小幅的单色为主。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后期，电影公司逐渐开始重视海报的制作，开始大量出现彩色印刷的大幅海报。

然而，创作这些电影海报的是些什么人呢？其实他们的水平一点也不比月份牌画家们差（有的也曾短时间当过月份牌画家），甚至名气更大。这里提三个名字：张光宇、姚吉光和丁聪。

制作于1934年的《再生花》1开幅面海报，是公认的中国现存最早的彩色大幅海报，它的作者是姚吉光。考证这个并不难，将海报图片放大，图中蝴蝶右耳耳环下面就有作者姚吉光的签名——吉光。

姚吉光，著名漫画家、报人，上海文史馆馆员。他和谢之光、张光宇、胡亚光等为同学，曾创办《福尔摩斯》等报刊，并为《大报》《上海滩报》《社会日报》等写稿和创作漫画，蜡烛影业公司宣传负责人，又得益于张聿光在上海青年会所办“画图函授部”。油画有法国马蒂斯作风，国画则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走兽，无所不能，卓然有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尔摩斯》创办人之一的姚吉光改以《光报》报名申请复刊。时姚已受聘《申报》任职，根据上海报业公会规定，凡在公会会员报工作的人员，不能再自办报纸。所以姚虽领取了登记证，《光报》仍不能出版。恰巧此时王雪尘主持的《罗宾汉》被罚停刊两个月，王雪尘就用改头换面的办法，借《光报》的名义，把《罗宾汉》的全部版面内容移花接木搬到《光报》上出版。《罗宾汉》停刊期满后，与《光报》同时发行。《光报》单独出版一个月，因刊载了一篇批评文章，触怒当局，被国民党政府上海市社会局吊销登记证，并追究发行人姚吉光擅自出报的责任，《光报》从此停刊。

《福尔摩斯》报前后办了4年，于1930年改为日刊，由姚吉光独办。出版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自行停刊。

从姚吉光先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早年学画并一直没有放下绘画。但他的主要兴趣和职业还是一名报人，媒体人。他以办报为主，间或担当电影公司的宣传负责人。他不仅在蜡烛影业公司担任宣传负责人，应该也曾为其他电影公司如明星影片公司干过宣传工作，《再生花》电影海报应该是他在那一时期绘制的。

2

1

3

院线大

映開天今

蝴蝶

宣景琳

鄭小秋

主演

鄭正秋

新
零

導演



全部對白有唱歌聲鉅片

再生花

明星影片公司 貴名出品



明星影片公司《再生花》电影海报

中国早期的电影公司，对影片的宣传还是非常重视的，各电影公司几乎都有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撰写并设计新片的广告和宣传稿件等。这些稿件主要发表在各大报刊，所以电影公司最喜欢聘用懂电影的媒体人来担当宣传负责人。其中最有名的是龚之方、周瘦鹃、柯灵，以及“上海电影界之宣传三杰”潘毅华、周世勋和杨敏时等。姚吉光不仅是懂电影的媒体人，还是高水平的画家，理当更受欢迎。

1946年，上海影人在抗战期间重庆经营戏院起家的蒋伯英、邵氏影业的邵邨人、周剑云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大中华电影企业公司（简称“大中华电影公司”），加盟的还有上海著名导演朱石麟、岳枫、胡心灵，演员李丽华、袁美云、周璇、龚秋霞、舒适等。4年间大中华电影公司共拍摄了34部国语电影，影片主要在上海及内地上映，有好几部曾风靡全国。

姚吉光也应邀加盟了大中华电影公司，司职宣传科的美术创作员，创作了大量

电影海报。现在能见到的实物有：1947年的《满城风雨》《龙凤呈祥》，1948年的《风雪夜归人》等。其中《满城风雨》还是大导演李翰祥首次触电之作，关于此海报另有精彩的故事。

此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其绘画水准和历史地位可与同期开宗立派的大画家并列，他就是张光宇。

张光宇（1900—1965），江苏无锡人。中国最杰出的老一辈漫画家、装饰画家、工艺美术教育家，创立了对现代美术影响深远的“装饰”派艺术，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张光宇15岁开始在上海的“新舞台”戏院学习舞台美术。20岁的时候，与顾肯夫、陆洁一起编辑《影戏杂志》，此为中国最早的影刊之一。



姚吉光创作的《风雪夜归人》电影海报（1开幅面）局部

1925年起，在英美烟草公司广

告部任职 7 年，也曾画过月份牌广告画，后来开始创作漫画和讽刺画。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初，张光宇先生的漫画创作进入高峰期，大量的讽刺漫画、时事漫画、幽默漫画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中国传统戏剧的、中国民间的和现代东西方的各种新颖、具有生命力的视觉艺术因素，被他巧妙地吸收到个人的风格技巧之中，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他特有的装饰性造型语言风格和艺术表现方式。到三四十年代，张光宇先生已成为上海漫画界的核心人物。

张光宇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和主要成就还体现在动画片。

过去美术片、动画片不用现在的叫法，称“漫画与电影结合的卡通”或者“卡通片”。20 世纪 20 年代，张光宇先生与后来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的万籁鸣先生相识，并和他一起成为中国动漫电影的先行者。还曾和后来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和漫画家廖冰兄，在电影厂搞动画技术实验，解决了一直未能根本解决的动画跳动等技术问题。

张光宇是后来中国最经典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美术设计，其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龙王、玉皇大帝、太白金星、太上老君、土地、二郎神、哪吒、托塔李天王、四大天王等都是其原创。影片中的部分环境布景也是其杰作。

张光宇 1927 年就曾是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装历史大片《美人计》上下集的美术设计。该片还特别印制了大幅面的彩色电影海报，其作者是不是张光宇不得而知，也没有海报实物存世。但张光宇肯定是有画过电影海报的。

抗战期间和 40 年代，张光宇曾先后在重庆、香港的三家电影制片公司主持电影美术工作。1946—1948 年，应聘到香港大中华电影公司任美工主任职，从事电影美术设计工作。据传他在此期间还设计过电影海报，但没有记载。担任一部影片的美工师是比较繁忙的工作，海报往往另请别人绘制，姚吉光就是一位。

1948 年，张光宇又转入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担任总管理处美术主任，创作过多幅电影海报。如其在大中华电影公司设计有电影海报《大凉山恩仇记》原稿（共有两款）；其设计的海报原稿现存有 4 幅，另有《生与死》《风雨江南》现藏于上海美术馆。

20 世纪 50 年代起，张光宇从香港回到北京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教学之外，他承担了新中国许多重要的美术设计方面的任务，其中包括电影、戏剧的美术设计和艺术顾问的工作。如话剧《屈原》、评剧《牛郎织女》、越剧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戏曲艺术片《梅兰芳舞台艺术》等。

著名漫画家丁聪（1916—2009），生于上海，笔名小丁。他的父亲丁悚是中国



姚吉光创作的海报均有其本人签名，为“吉光”。与 20 世纪 30 年代创作《再生花》时期落款“吉光”的写法都有一点不同

现代漫画先驱，丁聪子承父业也是一代漫画大家。早年丁家就是朋友常来常往的聚所，来客多是新闻界、演艺界、文化界的朋友，如张光宇、叶浅予、王人美、黎莉莉、周璇、聂耳、金焰、黎锦晖等，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丁聪把漫画的主要对象就锁定在这些生活圈内的电影界人物。

1936年，丁聪曾在新华影片公司任美术设计，他为公司拍摄的《狂欢之夜》绘制过海报。

抗日战争时期，丁聪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从事画报编辑、舞台美术设计、艺专教员和画抗战宣传画等工作，1940年至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美术师，期间是否画过电影海报目前无从知晓，但他80年代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画过的海报至今都很经典，比如《阿Q正传》《甜蜜的事业》。

其他已知的民国期间电影海报的设计者还有唐旭升，他是明星影片公司的设计师，在1936年创作设计了吴村导演的电影《春之花》海报。王沧，为南国影业公司美术师，绘制过1949年出品的电影《羊城旧恨》海报。后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教授的高孟焕，1947年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制”）影片《松花江上》创作过海报。

随着电影宣传活动的专业化，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还诞生了一批从事电影广告宣传的广告公司，比如明星影片公司凤昔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大中华广告社，主要承接各类电影广告宣传业务，天一影片公司的海报一度由该广告社负责制作。很多电影海报，均由这些广告社聘用的美术师设计绘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他们的名字。

在现存的民国时期的电影海报中，根据海报上的署名落款的线索，还可以找到几位作者，但由于这些落款都是目前名不见经传的笔名或艺名，比如礼良、百琪、Chang等。鉴于目前资料有限，破解他们的身份还需要反复查证。



南群影业公司《风雨江南》海报原版

改名才有《出路》

中国早期电影人郑基铎 1905 年生于朝鲜。1928 年在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担任过演员和导演。曾与阮玲玉一起演过《情欲宝鉴》，导演过《爱国魂》《三雄夺美》《银幕之花》等武侠风格的影片。

1930 年，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停业后，郑基铎离开上海奔赴东京。1933 年，郑基铎从东京回到上海，经金焰介绍，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拍了一部由沈浮编剧、郑君里主演的电影《出路》。

受当时上海左翼电影创作的影响，进入联华影业公司的郑基铎改名叫郑云波，后在联华影业公司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完全抛弃了过去的武侠套路，转向社会题材，寻求艺术风格上的改变。《出路》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悲剧。但是此片却让郑基铎经历了进入中国电影界最严格的电影审查。执行这次审查的机关是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

这个叫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机构，隶属于 1931 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内务部联合组建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在此之前的 1923 年，教育部便制定了电影审查规则，1930 年立法院颁布了《电影检查法》，统一了全国的电影检查制度，掀起了电影检查运动。

电影检查运动主要是反对西方和本国的淫秽及神鬼武打电影，提倡符合中国国情、弘扬民族精神、富有民众教育意义的电影。电影检查委员会还举办了年度优良国产影片大赛并积极推介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

1933 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米兰国际电影节，电影检查委员会选出 6 部影片参展，它们分别是联华影业公司的《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野玫瑰》和记录片《北平大观》，以及明星影片公司的《自由之花》。

1935年在苏联举办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明星影片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以及联华影业公司的《渔光曲》《大路》等8部影片代表中国影片参赛。其中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获“荣誉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获国际电影奖项的电影作品。

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初期对左翼影片并不敏感，但是到了1932年以后就比较复杂了。为了直接打击左翼电影，电影检查委员会于1934年强行撤销明星影片公司的编剧委员会，1935年还逮捕了田汉和阳翰笙。

1933年，郑君里的《出路》遭到电影检查委员会禁映，理由是：影片结尾表现了主人公参加“一·二八”事变的场景。电影检查委员会因此勒令联华影业公司将结局改为响应政府号召去西北垦殖，片名也要求改为《光明之路》。由于影片删修不断，因此《光明之路》一直到1934年3月20日才在上海等地公映。



墙上贴的《蝴蝶夫人》
《华山艳史》海报



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部曾召集全国的电影公司负责人在南京召开谈话会，参加的有郑正秋、周剑云、邵醉翁